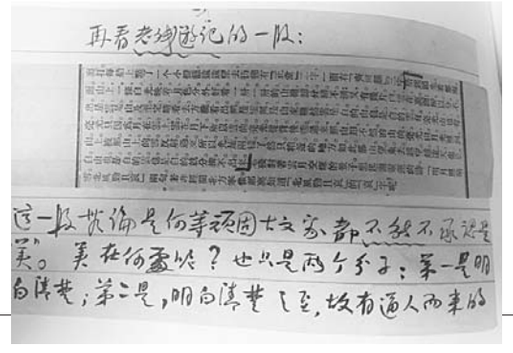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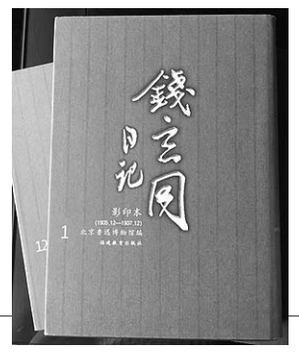
钱玄同收藏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封面，该期发表了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。



胡适写给钱玄同的信，以《老残游记》为例，阐释文学的三要件。



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著的《钱玄同日记》。

刘半农与钱玄同(左)摄于孔德学校。

■ 新文学先锋·纪念文学革命100周年

1918年，《新青年》的热心读者、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讲师陈大齐写信给钱玄同。他形象地将旧文化譬之为臭粪，而“我们中国人苦于没有辨别力，不知道哪种是粪，哪种不是粪”。由此，他呼吁钱玄同用些心力，“编一部《粪谱》……使我们同胞见了，也可以知道粪的所在”。

《扫雪斋主人：钱玄同传》作者周维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。

钱玄同：“新青年”要保护人眼……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 逄春阶

时光的齿轮啮合着前进。如果逆向拨转100年，依然酷暑天，时任北京大学文字音韵学教授的钱玄同，正频繁光临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。他通常是午后四时到，吃过晚饭，与鲁迅谈到十一二点才返回。

此时的钱玄同，也深受时局刺激，得出一个极明确的教训：“知道凡事是前进，决无倒退之理。”

这一年，钱玄同30周岁。在与朋友圈的切磋琢磨中，他的思想完成巨变，也随即通过教育、学术、写作、编辑等活动，投身正在变革的社会中，在新文学星空中透射着璀璨的光辉。

为《新青年》摇旗呐喊

时代总是推着人在朝前走。“有两次事变，彻底轰毁了钱玄同的复古思路。一是1915年12月12日，袁世凯宣告恢复帝制；再就是1917年又发生张勋拥戴溥仪复辟帝制。这一系列事变，使钱玄同大受刺激，他由‘反清排满’时代恢复汉民族的‘古’，转变成反对复古，并投身于新文化运动。”现供职浙江教育报刊总社、《扫雪斋主人：钱玄同传》作者周维强先生介绍道。

在两次事变之间，钱玄同于夹缝中完成思想的裂变。1916年下半年，北京发生猩红热，他足不出门，家中只有一种提倡法兰西革命的书。他随手读之，竟大受刺激。后来，他专门向人介绍那时的感觉：“清新之气象，油然而生，不啻病榻之旁，打一兴奋针，得益非浅。”

钱玄同当年看的哪本提倡革命之书，至今成谜，那段看书时的经历却清晰而痛彻心扉。当时他全家租住在宣武门外香炉营头条，由于家中孩子大人传染了猩红热，钱玄同只能待在家里照顾家人，连日记都停了。一岁多的小儿子因传染上猩红热夭折，夫妇俩哭得甚为伤心。

1917年初，已搬过两次家的钱玄同，又举家迁居琉璃厂西北园。1921年初，迁居东城赵堂子胡同。1922年秋，迁居景山东街大学夹道。1930年春，迁居沙滩。1933年9月，移双辇胡同37号，直到去世。当年名满京城的钱玄同教授，在北京“漂”了二十多年，连套正经的房子都没置办。他经常告诫孩子：“我们家是清寒之家，无房无地，只有靠双手和大脑去劳动才能生活。”

据钱家长子钱秉雄回忆：“我们家在北京住了二十多年，搬了七次家。原因总起来不外乎三种：一、逃难；二、子女因病死亡；三、为子女就近读书。父亲很少考虑自己，他常坐着车东、西、南、北城跑来跑去。”

不爱居家的钱玄同，有两大爱好，一是逛厂甸旧书肆，二是找朋友聊天。每次逛厂甸旧书肆，总要把喜爱的书籍扫荡一空才罢休，被朋友戏称为“厂甸巡阅使”。

周作人说钱玄同“善于谈天，也喜欢谈天”。“钱玄同谈话庄谐杂出，用自造新典故，说转弯话，或开小玩笑，说者听者皆不禁发笑，但生疏的人由于不懂这些‘钱氏典故’而不能索解。”湖州师范学院教授余连祥介绍道。

钱玄同的好友黎锦熙曾回忆，两人见面除了探讨有关国语等学术问题外，“同时必杂谈所见所闻，天南地北，无所不说；古今中外，愈引愈长。他熟于戊戌以后迄于当代的秘闻轶事，性情之隐微秘密，言行之滑稽突梯，凡其所知，亘数十年，无不罄述”。

钱玄同把到朋友家谈天叫“生根”，一聊起来就忘了走或者不愿意走，屁股像生了根似的。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则说钱玄同“生根”的习惯为早则下午四时，晚则六时，提了他的皮包、手杖进了各家的客厅或书房，坐下了以后，海阔天空地谈起来。“我所得益于先生的‘知人论世’‘言道治学’种种方面，全是在这些时间里。”

钱玄同在日本留学时，“生根”的地方主要为老师章太炎处。来到北京后，交游范围扩大了。容其“生根”的朋友家主要有十几家：鲁迅、周作人、沈士远、胡适、单不庵、刘半农、马隅卿、马幼渔、马叔平、黎锦熙和魏建功等。

到鲁迅的住所“生根”，钱玄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，脱下长衫，在鲁迅对面坐下。聊天的话题自然十分广泛，除了催促鲁迅执笔为《新青年》杂志写稿外，还围绕张勋复辟，以及造成这一历史倒退原因的讨论。

催生出《狂人日记》，可见钱玄同之洞察。“我的理智告诉我，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，文章应该用白话做，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愿意给他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。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，是国内数一数二的，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《新青年》写文章。”他曾解析道。

“焚烧荆棘，荡夷污泽”

“钱玄同自幼受过严格的中华古典教育，既体现于严厉的教育方式，也体现于教育的内容，核心正是‘吃人的礼教’。这种教育在其反面，给钱玄同播下了叛逆‘礼教’的种子。当钱玄同思想巨变之后，他回过头来，更能以过来人的经历，击中‘礼教’的要害。”周维强介绍道，钱玄同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频频发表文章。“因为他是章氏高足，深谙文字学和经学，痛快淋漓，最大胆，最振奋人心，言论丰采，震烁一时。

1936年的钱玄同。

其实钱玄同这种“激烈”，或多或少受到老师章太炎的影响。章太炎敢于拼命和穷究学问的精神，被鲁迅誉为“有学问的革命家”“并世无第二人”。

1916年6月6日，袁世凯去世，黎元洪继任大总统；16日，被囚禁了三年的章太炎获释，然后离京返沪。在京三年，他四易囚所，两次绝食，两回逃奔，多次辱骂袁世凯，表现了他勇敢的战斗精神。这种精神也感染了钱玄同，他在探视被监禁的章太炎时，章太炎曾赠以陆象山四句语录来激励他：“激厉奋迅，决破罗网，焚烧荆棘，荡夷污泽！”

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，在念及往事时，还对章太炎赠给钱玄同的四句语录甚为感慨地说：“……先生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何等和平谦虚，而与这四句话表面不相像，但在另一方面正显示着先生光明自由的精神。”

钱玄同与章太炎师生之谊可谓保持一生。自1906年至1936年，整整30年间，章太炎致钱玄同59封信。钱玄同将这些信函小心地装裱成册，并一一注明日期，从何处寄往何地，足资对老师函件珍惜程度。

在这59封信中，有一个空缺期，即1919年至1929年这10年左右，这期间钱玄同正致力新文化运动，他批判“桐城谬论”和“选学妖孽”，提倡“白话文”，反对“旧礼教”，拥抱“科学民主”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先锋。他的言论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，其影响甚至超过他的老师当年带头的“反满革命”，他的激烈甚比“七次追捕、三入牢狱”的章太炎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章太炎为了抵孔，站在古文经学立场驳斥康梁保皇的今文经学，否定今文的“微言大义”。而钱玄同为了“反满”，提倡“复古”，但他要复一切古，比他老师更激烈。钱玄同为了推动“新文化运动”，要把“经书”都扔到粪坑中去，提倡“疑古”，甚至要怀疑一切的古，还要消灭“汉字”，改用罗马字母……这一切令人瞠目。

钱玄同先生提倡新文化运动，蔑视一切旧规，极像章太炎当年反满革命气概。章太炎与钱玄同为政为学往往义无反顾，激烈异常，但他们待人却甚和蔼。章太炎几位成就最大的弟子与他性格相似，连寿命也几乎相同，黄侃只活到五十，钱玄同活到五十二，鲁迅五十五，吴承仕五十六。

“为文学界浮一大白”

“钱玄同和胡适是《新青年》时的同道，同为轮流主编之一，又同为北京大学教授，在新文学革命中互为响应，影响巨大。”湖州历史文化研究专家徐勇介绍道。

1916年12月26日，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。蔡元培为钱玄同父亲钱振常的得意门生。钱玄同去北京大学上课，常常顺便去拜访他。正是由于钱玄同、沈尹默等人的推荐，蔡元培才决定聘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。

1917年1月，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。此月出版的《新青年》1月号，发表了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。首创文学革命，主张文学改良，须从“八事”入手：须言之有物，不模仿古人，须讲求文法，不作无病之呻吟，务去滥调套语，不用典，不讲对仗，不避俗字俗语。

在接下来一期的《新青年》上，主编陈独秀亲自上阵，发表了《文学革命论》。他的言论更为激进果断：“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，高张‘文学革命’大旗，以为吾友之声援。”

“此时的文学革命，需要筚路蓝缕、以启山林之人。陈独秀、胡适的最早支持者便是钱玄同。”徐勇介绍道，1917年2月，钱玄同读过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后，第一次投书《新青年》。在该刊发表的《通信》一文中，他写道：“顷见5号《新青年》胡适之先生《文学刍议》，极为佩服。其斥骈文不通之句，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……具此识力，而言改良文艺，其结果必佳良无疑。惟选学妖孽、桐城谬种，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。虽然，得此辈多咒骂一声，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。”

“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，已是古文字学大家的钱玄同，能毅然从旧文化的营垒中突围出来，支持文学革命，其反戈一击的影响力如何估量都不为过。”徐勇赞叹道。

“那时候大家以为胡适是留美学生，由他来推翻中国的宝贝，有媚外嫌疑，大家对于他自然是反对的了。钱玄同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，对中国文字学很有研究，因此一般人都会注意他的言论。自他参加了文学革命以后，文学革命的声势，突然大起来了。”周维强介绍道。

陈独秀对此尤其欣喜，给钱玄同复信说：“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大家，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，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！”

“此后，钱玄同又发表了《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》等重要文章，提出了文章应加标点符号，数目字可改用阿拉伯字，凡纪年尽量改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元，书写方式‘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移’等主张。”余连祥说道。

“钱玄同教授则没有写什么文章，但是他却向独秀和我写了些小批评大捧场的长信，支持我们的观点。这些信也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。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。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，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。”“钱氏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。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，大为赏识，倒使我受宠若惊。”胡适晚年谈到当年情景曾如是说。

1917年初至1921年初，钱玄同经常住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宿舍。他的孩子们见他住的宿舍中除去床和书桌外，书架上满堆着书报杂志。书桌上除了文房四宝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黄铜制的蜡烛台，插在上面的白洋蜡点得剩下很短的一截儿，四周还有流下来的蜡烛油。“钱玄同常对孩子们说，夜深人静是读书写文章最好的时候。可见那时候他经常在两支白蜡烛光下写文章、看书到深夜。”余连祥说道。

“孤立的美，是没有的”

1917年初，《新青年》杂志编辑部由上海移至北京。1918年和1919年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钱玄同是轮流编辑人之一。1918年的次序是陈独秀、胡适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沈尹默、李大钊。《新青年》成了同仁杂志，包括鲁迅、周作人等，形成了《新青年》团体。

为了造成白话文的声势，彻底摧毁旧文学，钱玄同要求同伴们身体力行，把《新青年》全部改为白话文，并加新式标点。从1918年开始，钱玄同的这一提倡得到了实现，这一年1月15日出版的《新青年》4卷1号不仅改用了白话，加了新式标点，而且还发表了白话诗9首：胡适4首，沈尹默3首，刘半农2首。

黎锦熙对此评价道：“这是中国直行汉字而用新式标点符号排印的第一本书，出版时，许多人一见就哈哈大笑，以为怪物。”可见钱玄同当年提倡这些新生事物，不但有见识，有眼光，而且是有极大勇气的。

对于白话文诗歌，钱玄同是赞赏的。1918年1月10日，他为胡适的白话诗诗集《尝试集》做序，高度评价胡适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主张，认为这种“知”了就“行”，以身作则的精神值得佩服。他和胡适来往书信，现存世36封。其中，有胡适请教音韵学的信件，也有彼此阐述文学观点的信件。

在1920年10月14日的信中，胡适回答钱玄同何为文学的问题。胡适用最浅近的话说明文学有：“第一要明白清楚，第二要有力能动人，第三要美。”

在谈及“美”时，胡适阐述道：“孤立的美，是没有的。美就是‘懂得性’(明白)与‘逼人性’(有力)二者加起来自然发生的结果。”

胡适拿《老残游记》中写从齐河往济南眺望的一段文字举例：那南面山上，一条白光，映着月色，分外好看。一层一层的山岭，却分辨不清；又有几片白云在里面，所以分不出是云是山。及至定睛看去，方才看出哪是云哪是山来。虽然云是白的，山也是白的，云有亮光，山也有亮光；只因为月在云上，云在月下，所以云的亮光从背后透过来。那山却不然的：山的亮光由月光照到山上，被那山上的雪反射过来，所以光是两样了。然只稍近的地方如此。那山望东去，越望越远，天也是白的，山也是白的，云也是白的，就分辨不出来。老残对着云月交辉的景子，想起谢灵运的诗“明月照积雪，北风动且哀”两句。

“这一段无论是何等顽固古文家都不能不承认是美。美在何处呢？也只是两个分子：第一是明白清楚；第二是明白清楚之至，故有逼人而来的影像。除了这两个分子之外，还有什么孤立的美吗？没有了。”胡适的观点，至今读来，仍颇有教益。

“钱玄同提倡白话文，反对文言文，不仅是从文学上文体上的改革着想，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考量。他认为，文言文容易为君主专制制度所利用，而白话文则容易为民主制度服务。”周维强分析道。

“大抵中国人脑筋，二千年来沉溺于尊卑名分纲常礼教之教育，故平日做人之道，不外乎‘骄’‘诌’二字。富贵而骄，虽不合理，尚不足奇。最奇者，方其贫贱之时，苟遇富贵者临于吾上，则赶紧磕头请安，几欲俯伏阶下，自话受笞。一若彼不凌践我，便是损彼之威严，则我亦觉得没有光彩者然。故一天到晚，希望有皇帝，希望复拜跪。”钱玄同对国人德行的观察和思考，可谓深刻。

保护眼珠，换回人眼

1918年，《新青年》的热心读者、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讲师陈大齐在看到钱玄同发表的《随感录》后，写了一封信给钱玄同，寄希望于钱玄同能有所作为，唤醒民众，提高国民文化程度，启发国民觉悟，不要让他们被有害的物事所蒙蔽。

陈大齐在信中形象地将旧文化譬之为臭粪，而“我们中国人苦于没有辨别力，不知道哪种是粪，哪种不是粪”。由此，他呼吁钱玄同用些心力，“编一部《粪谱》……使我们同胞见了，也可以知道粪的所在”。

陈大齐还讲了这样一个笑话：一个患有眼病的人，去看外科医生。那位外科医生说他的眼睛不干净，便拿出来洗一洗，然后放在院子里晒，没成想让从天而降的老鸦衔走了。这位医生很无奈，便悄悄给这个人换了狗眼。过了几时，那病人又到外科医生家，外科医生问他：“你近来眼病还发吗？”他答道：“眼病大好了，却有一件怪事：自从请你挖出来洗过之后，见了粪只觉得黄黄的可爱，又香又甜。”

陈大齐说，“这个外科医生很是可恶”，恨不得人人都换上一只狗眼。所以，要一面努力想去换回那些被换的眼珠，一面更须想法保护那些没有换掉的眼珠。可用什么方法保护，用什么方法去换回，“这真是中国社会上顶大的问题呢！”。

钱玄同对此深有同感，指出那些张口纲常名教、闭口祖宗之法的人，就是要“用这种亡国灭种的圈套来陷害青年”。他给陈大齐回信说：

你说我们应该努力保护眼珠，努力去换回人眼来，这确是现在中国社会上顶大的问题，也是我们做这《新青年》杂志的惟一大目的。《新青年》出了将近三十本，千言万语，一言以蔽之曰，保护眼珠，换回人眼而已……

钱玄同和陈大齐的通信，一起发表于1918年12月15日《新青年》第5卷第6号上。钱玄同的这篇文章，反映了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，表明了他毕生的思想和事业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。

“钱玄同抱着这个思想，身体力行，把这个思想贯穿于他所从事的文化教育事业。编辑《新青年》杂志，勤快地写稿，只是他的这项事业的一个方面。”周维强解释道。“他审定国音，注音字母，提倡汉字简化。执教近三十年，为中国语言学界培养了大批英才。在史学界也有相当的贡献。他既反对‘泥古’，又反对‘蔑古’，用科学方法扩大辨伪运动。”

“无人共话小川町”

在当年《新青年》团体中，钱玄同的文章尽管影响很大，但一直文运不佳。像鲁迅、周作人，几乎每年都要新出一本集子，可以从北新书局拿到颇为丰厚的版税。钱玄同却一直没有编过自己的集子，自然就少了一笔版税收入。

1931年，钱玄同也曾考虑出版“文集”的事。主意既经打定，文章就得开始搜集。可甫一动手，问题就来了，因为他早年笃信古学，如今提倡新学，两者互相抵触。于是，他就确定一个原则：五四以前的，一概不要，而决定从《新青年》选起。选了几天，桌子一拍，大叫起来，说：“简直都是废话，完全要不得！”

钱玄同的好友周作人评论他好走两个极端，言行“不免有些矛盾地方”。他自己对此也毫不讳言，他说自己是像梁任公那样，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”。钱玄同为人坦荡，且诙谐豪爽，比周作人小两岁，偏偏又与周作人兴趣相投，过从甚密。

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后，钱玄同跟搬出八道湾的鲁迅日渐生疏，但仍为八道湾苦雨斋的常客，跟周作人的关系则比以前更亲密了。有一次，钱玄同在八道湾周宅聊天聊到深夜，主人留客在家住上一宿。钱玄同换了一张床睡，久难成寐，正辗转反侧，忽闻室中有“呱呱呱”的聒噪声，以为闹鬼，于是大声呼叫：“岂明救我！”周作人惊起，披衣而至，发现是蛤蟆进屋，鼓腮而鸣，顿时乐不可支。

一次，鲁迅偶遇钱玄同，两人竟为名片署名的小事产生嫌隙，相互调侃，闹得不欢而散。结果，鲁迅在写给许广平信中忿忿说他：“胖滑有加，唠叨如故”，也在抄给别人的诗中依旧嘲讽：“作法不自毙，悠然过四十；何妨赌肥头，抵当辩证法。”

“其实，钱玄同疏远鲁迅，其中原因之一，便是他与周作人一样，不认同鲁迅与许广平的师生恋情。”余连祥介绍道。

周作人与钱玄同相识三十余年，算得上真正懂得钱玄同的好朋友。“玄同的文章与言论平常看去似乎颇是偏激，其实他是平正通达不过的人……老朋友中间玄同和我见面的时候最多，讲话也极不拘束而且多游戏，但他实是我的畏友。浮泛的劝诫与嘲讽虽然用意不同，一样的没有什么用处。玄同平常不务苛求，有所忠告，必以谅察为本，务为受者利益计，亦不泛泛徒为高论。我最觉得可感，虽或未能悉用，而重违其意，恒自警惕，总期勿太辜负他的好意也。”

不过，钱玄同给自己的文集《疑古废话》拟定的各集颇有意思——44岁编的叫《四四自思辞》，55岁编《五五吾悟书》，66岁编《六六碌碌录》，77岁编《七七戚戚集》，但终究没有实现。

1939年1月17日，钱玄同突发脑溢血，不幸去世，年仅52岁。一百天后，周作人挥泪写下《最后的十七日》一文，文中收录他所作挽联：“戏语竟成真，何日得见道山记；同游今散尽，无人共话小川町。”

上联加注道：“前屡传君归道山，曾戏语之曰，道山何在，无人能说，君既曾游，大可作记以示来者。君殁之前二日有信来，覆信中又复提及，唯寄到时君已不及见矣。”

下联加注云：“余识君在戊申岁，其时尚号德潜，共从太炎先生听讲《说文解字》，每星期日集新小川町《民报》社。同学中龚宝铨、朱宗莱、家树人均先殁，朱希祖、许寿裳现在川陕，留北平者唯余与玄同而已。每来谈，常及尔时出入《民报》社之人物，窃有开天遗事之感，今并此绝响矣。”

周作人对钱玄同的追思连绵不绝，后来在《知堂回想录》里称：“民国以来号称思想革命，而实亦殊少成绩，所知者唯蔡孑民(注：蔡元培)、钱玄同二先生可当其选；但多未著之笔墨，清言既绝，亦复无可征考，所可痛惜也。”